

# 中共三大起义主力部队都在武汉形成

毛泽东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三大起义虽然发生在江西、湘鄂赣农村和广东，但起义的主力部队都是在武汉形成并从武汉出发的。

## 叶挺独立团起到了种子的作用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占领武汉，随后在武汉进行扩编。其中，叶挺所在的第四军扩编为两个军。12月，叶挺被任命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中共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建立的叶挺独立团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该团团长周士第、团参谋长余增生、第一营营长符克振、第二营营长卢德铭（后为周子昆）、第三营营长蒙九龄均为中共党员，连排长也大多为中共党员，中共依然直接领导掌握该团。

1927年春，因支援江西战役，大批国民革命军被从武汉调走。叶挺利用奉命留在武汉组建新部队的机会，亲赴广东、湖南，负责筹建第七十五团的工作。他收集留在广东、湖南的独立团伤病人员，组成了第七十五团的三个营，第七十五团的副团长、三个营长以及若干连排长均为中共党员，部队实际

为中共掌控。

1927年3月，叶挺调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由于该师军官大多离职投蒋，因此等于重新组建。团长以上主要干部都由第四军兼第十一军军长张发奎任命，张发奎大胆启用了一批中共党员，如他在口述自传中所说：“我钦佩共产党员的热忱与战斗精神。”

## 中共加紧“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一系列大屠杀血的教训，使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张太雷等为代表的不少中共领导者进一步认识到了党直接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在他们的推动下，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问题逐渐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

1927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用派我们自己人参军的办法来扩大叶挺和陈嘉佑领导的部队，在六个月之内把他们的几个师扩大为几个军。”6月1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其中明确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可是陈独秀认为：在我们同军阀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不



叶挺和家人合影

过，共产国际这个指示，在中共党内还是引起了不小波澜。

6月中旬，在周恩来、蔡和森等的倡议下，中央一度作出准备在湖南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的计划，并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初步实施。之后，“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问题也时常成为中央会议的讨论议题。后来，平、浏工农义勇队打着贺龙第二十二军独立团旗号在当地保存下来，南昌起义时追赶起义军未果，随后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最终，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

##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为主力

叶挺在1928年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特别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列入了武汉政府时期共产党能掌控的武装力量之中。的确，在三大起义中都有武汉中央军事

政治学校师生英勇奋斗的身影。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最初为政治训练班筹备处，后改为政治科，主要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负责，他委派中共党员包惠僧实际办理。政治科1927年1月扩充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3月又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指定恽代英、邓演达、谭延闿为常务委员。这样，中共党员恽代英便名正言顺地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主持日常工作。

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职员中，云集了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左派分子，在学员特别是新招的学员中，更是中共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占优势。1927年春，陈毅就在校担任中共委员会书记。

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师生，可以分为几类：一是由中共直接派到起义部队中的军校师生；二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4月和7月相继毕业的学员，他们先后被分配到军队工作，在革命危急关头，不少人脱离所在军队加入到起义部队；三是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6期学员改编的教导团中的部分人员；四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加入叶挺、贺龙部队的20余名女生，她们参加了南昌起义。（摘编自《党的文献》）

## 唐朝为何多晚婚

唐朝鼓励人们早婚配多生育，唐太宗李世民还曾下令地方官府，“庶人男女无家室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不得抑娶”，就是说，如果某地有男女一直没有结婚，当地官府要出钱帮助这些人嫁娶。但实际情况是，唐朝晚婚现象很普遍。这是为何？

一是深受南北朝婚姻崇尚门第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尤其是士人宁可晚婚也不娶他们眼中门第低的女子。很多年轻男性希望通过科举

谋得一官半职，然后娶豪门贵女以换得仕途顺利。因此在唐朝，男性三四十岁不结婚都不稀奇。

二是经济压力大。唐朝不光婚礼仪式繁琐，而且“彩礼”厚重，甚至中等水平的家庭举办一次婚礼也要倾家荡产。唐朝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曾因经济问题导致晚婚，如韩愈早年困苦，又4次科举落第，所以他直到29岁在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帐下出任幕僚后，方才娶妻生子。（摘编自《文史博览》）

## 北大教授群起呼吁承认苏俄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使中国学者与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他们纷纷表示认同这一新生政权，倾向于中苏两国应当尽快恢复并确立友好外交关系。

然而，当时的北洋政府对这一新生政权持消极观望的态度，迟迟不予承认，以致“十月革命”7年后，中苏的邦交问题仍悬而未决，竟一度成为外交难题。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以时任北大临时校长蒋梦麟为首，著名学者胡适、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北大学者群体决意向当局联名上书。1924年2月16日，北京《晨报》刊发了一通北大教授群体要求当局承认苏俄、速复邦交的联名公开信。两天之后，上海《时事新报》迅即转刊。

署名的47位北大教授一致认为，对苏俄革命及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观察与权衡，早应得出结论；承认这一新生政权，应当并无难点——无论从历史背景还是实际国情方面考察，中苏两国都理

应为“良友”。

联名公函中还特别提到，当时已有英国与意大利两国承认苏俄。《民国日报》2月8日就已刊发主编邵力子所撰《英意两国同时承认苏俄》一文，对北洋政府未能首先承认并与苏俄恢复邦交，感到极其遗憾与痛心。

联名公开信公开发表近一个月之后，因为从报刊消息上得悉，中俄邦交恢复似乎又有了一些阻碍，进度因之放缓，这47位北大教授为之忧心如焚，二次联名致函时任外交部长顾维钧，表达了对中俄恢复邦交的热切关注与迫切希望。不过，因种种原因，该信再未能于京沪两地报刊公开刊登出来。

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在北京签署。这一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中俄恢复邦交与中苏确立邦交相关外交工作的开启。6月7日，《北京大学日刊》第1488号刊发了两个整版的公告，总题为《庆祝中俄恢复邦交》。（摘编自《人民政协报》）

